

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

总主编：章开沅 副总主编：周 勇



档案文献·甲

抗战时期大后方 经济开发文献资料选编

主 编 ● 唐润明

副主编 ● 胡 懿



NLIC2970869041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档案文献·甲

抗战时期大后方 经济开发文献资料选编

编委会名单

主任委员：况由志 陆大钺
副主任委员：郑永明 潘 樱
委 员：况由志 陆大钺 陈治平 李旭东 李玳明
郑永明 潘 樱 唐润明 胡 懿
主 审：况由志 郑永明
主 编：唐润明
副 主 编：胡 懿
编 辑：唐润明 胡 懿 冯丽霞 罗永华 高 阳



NLIC297086904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抗战时期大后方经济开发文献资料选编 / 唐润明主编.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2.12

ISBN 978-7-229-05875-3

I. ①抗… II. ①唐… III. ①经济史—史料—汇编—西北地区—1937~1945 ②经济史—史料—汇编—西南地区—1937~1945
IV. ①F129.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65003 号

抗战时期大后方经济开发文献资料选编

KANGZHAN SHIQI DAHOUFANG JINGJI KAIFA WENXIAN ZILIAO XUANBIAN

主编:唐润明 副主编:胡 懿

出 版 人:罗小卫

责任编辑:曾海龙 林 郁

责任校对:何建云

装帧设计: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陈 永 吴庆渝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 庆 出 版 社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400016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

重庆华林天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023-688094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90mm×1240mm 1/16 印张:47.25 字数:743 千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29-05875-3

定价:94.5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023-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

编纂委员会

总 主 编：章开沅

副总主编：周 勇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山田辰雄 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教授

马 振 犊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副馆长、研究馆员

王 川 平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名誉馆长、研究员

王 建 朗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方 德 万 英国剑桥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巴 斯 蒂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教授

西村成雄 日本放送大学教授

朱 汉 国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任 竞 重庆图书馆馆长、研究馆员

任 贵 祥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中共党史研究》主编

齐 世 荣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刘 庭 华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

汤 重 南 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步 平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何 理 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会长、国防大学教授

麦 金 农 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教授

- 玛玛耶娃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教授
- 陆大钺 重庆市档案馆原馆长、中国档案学会常务理事
- 李红岩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研究员、《历史研究》副主编
- 李忠杰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
- 李学通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近代史资料》主编
- 杨天石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 杨天宏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 杨奎松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 杨瑞广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
- 吴景平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 汪朝光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 张国祚 国家社科基金规划办公室原主任、教授
- 张宪文 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 张海鹏 中国史学会会长、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 陈晋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
- 陈廷湘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 陈兴芜 重庆出版集团总编辑、编审
- 陈谦平 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
- 陈鹏仁 台湾中正文教基金会董事长、中国文化大学教授
- 邵铭煌 中国国民党文化传播委员会党史馆主任
- 罗小卫 重庆出版集团董事长、编审
- 周永林 重庆市政协原副秘书长、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名誉会长
- 金冲及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常务副主任、研究员
- 荣维木 《抗日战争研究》主编、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 徐勇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 徐秀丽 《近代史研究》主编、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 郭德宏 中国现代史学会会长、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 章百家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
- 彭南生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傅 高 义 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前主任、教授
温 贤 美 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员
谢 本 书 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简 笙 簧 台湾国史馆纂修
廖 心 文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
熊 宗 仁 贵州省社科院研究员
潘 洵 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魏 宏 运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编辑部成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朱高建 刘志平 吴 畏 别必亮 何 林 黄晓东 曾海龙 曾维伦

总 序

章开沅

我对四川、对重庆常怀感恩之心,那里是我的第二故乡。因为从1937年冬到1946年夏前后将近9年的时间里,我在重庆江津国立九中学习5年,在铜梁201师603团当兵一年半,其间曾在川江木船上打工,最远到过今天四川的泸州,而启程与陆上栖息地则是重庆的朝天门码头。

回想在那国破家亡之际,是当地老百姓满腔热情接纳了我们这批流离失所的小难民,他们把最尊贵的宗祠建筑提供给我们作为校舍,他们从来没有与沦陷区学生争夺升学机会,并且把最优秀的教学骨干稳定在国立中学。这是多么宽阔的胸怀,多么真挚的爱心!2006年暮春,我在57年后重访江津德感坝国立九中旧址,附近居民闻风聚集,纷纷前来看望我这个“安徽学生”(当年民间昵称),执手畅叙半个世纪以前往事情缘。我也是在川江的水、巴蜀的粮和四川、重庆老百姓大爱的哺育下长大的啊!这是我终生难忘的回忆。

当然,这八九年更为重要的回忆是抗战,抗战是这个历史时期出现频率最高的词语。抗战涵盖一切,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记得在重庆大轰炸最频繁的那些岁月,连许多餐馆都不失“川味幽默”,推出一道“炸弹汤”,即榨菜鸡蛋汤。……历史是记忆组成的,个人的记忆汇聚成为群体的记忆,群体的记忆汇聚成为民族的乃至人类的记忆。记忆不仅由语言文字承载,也保存于各种有形的与无形的、物质的与非物质的文化遗产之中。历史学者应该是文化遗产的守望者,但这绝非是历史学者单独承担的责任,而应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因此,我对《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编纂出版寄予厚望。

抗日战争是整个中华民族(包括海外侨胞与华人)反抗日本侵略的正义战争。自从19世纪30年代以来,中国历次反侵略战争都是政府主导的片面战争,由于反动统治者的软弱媚外,不敢也不能充分发动广大人民群众,所以每次都惨遭失败的结局。只有1937年到1945年的抗日战争,由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长期内战的国共两大政党终于经由反复协商达成第二次合作,这才能够实现史无前例的全民抗战,既有正面战场的坚守严拒,又有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英勇杀敌,经过长达8年艰苦卓绝的壮烈抗争,终于赢得近代中国第一次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我完全同意《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的评价:“抗日战争的胜利成为了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振兴的重大转折点,为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奠定了基础。”

中国的抗战,不仅是反抗日本侵华战争,而且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在“脱亚入欧”方针的误导下,逐步走上军国主义侵略道路,而首当其冲的便是中国。经过甲午战争,日本首先占领中国的台湾省,随后又于1931年根据其既定国策,侵占中国东北三省,野心勃勃地以“满蒙”为政治军事基地妄图灭亡中国,独霸亚洲,并且与德、意法西斯共同征服世界。日本是法西斯国家中最早在亚洲发起大规模侵略的战端,而中国则是最早投入反法西斯战争的先驱。及至1935年日本军国主义通过政变正式成为法西斯国家,两年以后更疯狂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由于日本已经与德、意法西斯建立“柏林—罗马—东京”轴心,所以中国的全民抗战实际上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并且曾经是亚洲主战场的唯一主力军。正如1938年7月中共中央《致西班牙人民电》所说:“我们与你们都是站在全世界反法西斯的最前线上。”即使在“二战”全面爆发以后,反法西斯战争延展形成东西两大战场,中国依然是亚洲的主要战场,依然是长期有效抗击日本侵略的主力军之一,并且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极其重要的贡献。2002年夏天,我在巴黎凯旋门正好碰见“二战”老兵举行盛大游行庆祝法国光复。经过接待人员介绍,他们知道我也曾在1944年志愿从军,便热情邀请我与他们合影,因为大家都曾是反法西斯的战士。我虽感光荣,但却受之有愧,因为作为现

役军人,未能决胜于疆场,日本就宣布投降了。但是法国老兵非常尊重中国,这是由于他们曾经投降并且亡国,而中国则始终坚持英勇抗战,主要是依靠自己的力量赢得最后胜利。尽管都是“二战”的主要战胜国,毕竟分量与地位有所区别,我们千万不可低估自己的抗战。

重庆在抗战期间是中国的战时首都,也是中共中央南方局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所在地,“二战”全面爆发以后更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远东指挥中心,因而具有多方面的重要贡献与历史地位。然而由于大家都能理解的原因,对于抗战期间重庆与大后方的历史研究长期存在许多不足之处,至少是难以客观公正地反映当时完整的社会历史原貌。现在经由重庆学术界倡议,并且与全国各地学者密切合作,同时还有日本、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等外国学者的关怀与支持,共同编辑出版《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堪称学术研究与图书出版的盛事壮举。我为此感到极大欣慰,并且期望有更多中外学者投入此项大型文化工程,以求无愧于当年的历史辉煌,也无愧于后世对于我们这代人的期盼。

在民族自卫战争期间,作为现役军人而未能亲赴战场,是我的终生遗憾,因此一直不好意思说曾经是抗战老兵。然而,我毕竟是这段历史的参与者、亲历者、见证者,仍愿追随众多中外才俊之士,为《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的编纂略尽绵薄并乐观其成。如果说当年守土有责未能如愿,而晚年却能躬逢抗战修史大成,岂非塞翁失马,未必非福?

2010年已经是抗战胜利65周年,我仍然难忘1945年8月15日山城狂欢之夜,数十万人涌上街头,那鞭炮焰火,那欢声笑语,还有许多人心头默诵的杜老夫子那首著名的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即以此为序。

庚寅盛暑于实斋

(章开沅,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现任华中师范大学东西方文化交流研究中心主任)

序 论

唐润明

我国西部地区幅员辽阔,蕴藏丰富。古代的西北不仅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中国文化的发源地,而且长时期是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西南地区则气候湿润、水源充足、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四川更享有“天府之国”之美誉。但自明代中叶以来,由于航海业的发展和经济重心的南移,使得我国东部沿海地区逐渐发展成为国家经济的中心,加之适宜的气候,便利的交通以及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等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迅速发展,而广大的西部地区则开始被视为“边陲地带”,长时期处于一种交通阻塞、信息封闭、思想落后、民穷财尽、困苦不堪的状态,与东部地区的发展差距也越来越大。在此期间,虽然也不时泛起一些开发西部特别是西北之时论,但均音微势弱,影响不大。直到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动荡的历史才给地处边陲、向来落后的中国西部带来一次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促使广大的西部地区发生着巨大变化。

导致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西部地区发生历史巨变的主要原因,是中日战争的爆发及国民政府的西迁重庆。执政的国民党中央在中国东部沿海广大富庶地区或沦为敌手或处于战区的同时,为配合其政治、军事的需要,先是将华北、华东、华中等地的机关、厂矿、学校、科研团体等最大努力地内迁西部各地;继而又在工业、农业、交通、金融、文化教育等方面制颁一系列的方针政策与法规法令,全力奖助上述各业的发展,在有力支撑长达八年、艰苦异常的抗日战争,维护国民党统治的同时,也促进了中国西部地区的开发和进步,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中国东西部地区的发展差异,推动了整个中国历史与中国社会的进步,并为西部地区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一、抗战前后中国西部开发的历史梗概

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的经济开发,是在“战争”这一特殊的历史背景和条件下被迫进行的,所以无论是当时民间社团的一切主张、言论与建议,还是政府当局制定颁布的所有政策、法规和法令,无一不是以“军事第一,服务战争并最终赢得战争的胜利”为出发点和目的的,因而也就无一不留下战争的痕迹和时代的烙印。特殊的历史条件、历史背景与历史事实,要求我们在研究抗战时期大后方的经济开发时,必须首先将其纳入“战争”这一特定的范围内来考察。

由于历史的多方面原因,使得进入近代社会以来的中国的一切建设事业诸如政治统治中心的形成,经济事业的建立与发展,文化教育事业的设置以及军事防御的部署等,大多集中于东北、华北、华东等东部沿海地区,广大的西部地区则因交通的限制以及各个地方军阀的混战不休,长时期处于一种地瘠民困的混浊状态,其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发展,与东部沿海地区越拉越大,形成巨大的差别。

据不完全统计,在抗战爆发之前,中国有合乎《工厂法》的工厂 3 935 家,资本 377 857 742 元,其中绝大部分集中在东部的上海(工厂 1 235 家,资本 148 464 463 元)、浙江(工厂 783 家,资本 26 183 976 元)、江苏(工厂 318 家,资本 39 562 718 元)、青岛(工厂 148 家,资本 6 051 090 元),而占全国土地总面积 53.62%(全国 38 个省市区共 11 562 588 平方公里,西部 10 省共 6 200 216 平方公里)、总人口 24.57%(全国为 471 245 763 人,西部 10 省为 115 809 844 人)的西部 10 省,仅有工厂 344 家,约占全国总数的 8.74%^①;在 1936 年全国(东北除外)成立的 193 家新式工厂中,西部 10 省区只有 5 家,仅占总数的 2.59%^②;在全国所有的 1 397 653 千市亩耕地面积中,西部 10 省只有 328 692 千市亩,约占全国总数的 23.51%;在 1937 年底全国所有的

① 土地面积数、人口数分别见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编制:《中华民国统计简编》,中央训练团 1941 年 2 月印行,第 19、20 页;工厂数见简贯三著:《中国工业建设的分区问题》,载《财政评论》第 14 卷第 1 期。

② 实业部统计处编印:《民国二十五年全国实业概况》,1937 年 3 月版,第 50~51 页。

110 952 公里公路中,西部地区只有 28 370 公里,约占总数的 25.56%;在全国 164 家银行总行、1 927 家分行中,西部地区只有总行 23 家、分行 227 家,分别占总数的 14.02%、13.95%;在全国 108 所高等院校中,原设于西部各省的仅 9 所,约占总数的 8.33%;在全国 1 304 所医院中,西部各省仅有医院 172 所,约占总数的 13.19%;而作为国家和地方各项事业发展基础源泉的财政税收收入,西部各省不仅收入甚微(1936 年度仅 72 756 657 元,只占全国总数 385 328 575 元的 18.88%),且相当省份在很长时期内均无正规的财政预决算制度,而是处于一种随收随支的混浊状态^①。

此种经济文化分布的差异性,不仅造成了中国东西部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极不平衡,而且也给没有强大海空军军备以保卫领海领空的中国国防带来诸多不利。这种不利到了 20 世纪 20 年代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我国东北三省,其全面侵略中国的野心昭然若揭之后,表现得更为明显和突出。对此,当时的一切有识之士,都深刻地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和迫切性,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和对策——即向中国内陆发展。

早在 1919 年,护国军著名将领蔡锷在其辑录出版的《曾胡治兵语录》一书的结论中,就曾指出:“鄙意我国数年之内,若与他邦以兵戎相见,与其为孤注一掷之举,不如据险以守,节节而防,以全我军而老敌师为主,俟其深入无继乃一举歼除之。”^②与蔡锷同学的我国著名军事理论家蒋百里也在 1922 年撰文指出:面对临近我国日富侵略性国家之唯一制胜方法,“即是事事与之相反:彼利速战,我恃之以久,使其疲惫;彼之武力中心在第一线,我则置之第二线,使其一时有力无处用”^③。嗣后,我国的一些著名专家学者如傅斯年、胡适、丁文江等人,在全面分析比较了中日两国各方面的情形后,继续坚持并发扬光大着这种在敌强我弱、敌大我小的条件下,滞敌胜敌的唯一有效办法就是转向内地,持久作战的思想。他们纷纷撰文指出:“中国在抗战之初,不能

① 以上统计数字均见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编制:《中华民国统计简编》相关章节,中央训练团 1941 年 2 月印行。

② 转引自台湾吴相湘著:《中国对日总体战略及若干重要会战》,载薛光前编著:《八年对日抗战中之国民政府》,(台湾)商务印书馆印行,1978 年 11 月版,第 56 页。

③ 转引自台湾吴相湘著:《中国对日总体战略及若干重要会战》,载薛光前编著:《八年对日抗战中之国民政府》,(台湾)商务印书馆印行,1978 年 11 月版,第 57 页。

打胜日本,却可以长久支持,支持愈久,对我们越有利。”胡适则更明确地提出了要以最大的限度,以牺牲华北、华东等沿海、沿江口岸的决心,坚持“三年至四年的混战、苦战、失地、毁灭”,“我们只能期望在我们打的稀烂而敌人也打的疲于奔命的时候,才可以有国际的参加和援助”。胡适还认为“长期苦斗为不可避免的复兴条件”。

面对日益险恶的中日形势,执政的国民党中央政府同样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所以当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后,执政的国民党中央即于事变后的第三天也即1月30日,向中外各国发布《国民政府移驻洛阳办公宣言》,宣布国民政府迁都洛阳办公。考虑到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特别是中日两国战争的不可避免以及以首都南京为中心的东部沿海地区在对外战争中所处的不利地位,1932年3月在洛阳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四届第二次中央全会,就将“我们今后是否仍以南京为首都,抑或应该在洛阳要有相当的时间,或者我们更要另找一个适宜的京都”作为一个“重大问题”,第一次正式提上国民党中央全会的议事日程,并视之为“此次会议的第一要义”^①。会议讨论通过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所提的《提议以洛阳为行都以长安为西京案》,并作出了“(一)以长安为陪都,定名为西京;(二)以洛阳为行都;(三)关于陪都之筹备事宜,应组织筹备委员会,交政治会议决定”的重要决定^②。此举表明,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国民党中央政府就确定了一旦战争爆发,即向中国内地迁移和发展的战略方针。

以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的召开为契机,国民党中央政府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直到1935年10月蒋介石策定四川为对日抗战的根据地),都是将其开发建设中国西部的重点放在了中国的西北和中原地区。1932年5月,西京筹备委员会的成立以及1933年10月全国经济委员会西北办事处的设立,都表明国民党中央已将西北的各项建设纳入其施政日程。此后,不仅是国民党中央将西北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建设作为施政的重点之一进行;而且以张人杰、邵力子、邵元冲、张继、戴季陶为首的一大批在国民党中央有实力和

① 汪精卫在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上所致开幕词,载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142页。

② 台湾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编:《革命文献》第89辑——《抗战前国家建设史料——西北建设》(二),1981年12月版,第4页。

影响的人士,对西北的建设和宣导更是不遗余力。“开发西北”、“建设西北”的呼声也是此伏彼起,成为当时全国最为响亮的口号和最具影响的声音。一时间,有关开发西北的提案诸如《开发西北案》、《促进西北教育案》、《西北国防经济之建设案》、《拟请组织健全机关集中人力财力积极开发西北以裕民生而固国本案》、《请设国立西北大学以宏造就而免偏枯案》等,相继在国民党的历次中全会或中常会上提出和通过;新亚细亚学会、开发西北协会、西北问题研究会等学术团体也纷纷成立;时人有关开发西北之建议、调查、计划和报告等言论,更是充斥于全国各个报纸杂志之中;前往西北各地进行考察、调查和研究的个人和团体,也是不绝于途。在全国界的共同努力下,不仅陪都西京的筹备工作逐步推进,而且西北地区的其他各项事业也得到自民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大规模开发,各项建设在原有基础上均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和进步。到1937年初,公路方面完成了自西安至兰州全长约750公里的西兰公路和由西安至汉中全长约390余公里的西汉公路;铁路方面延长了陇海铁路;民用航空方面开辟了从兰州经宁夏至包头的航线;水利方面更于全国经济委员会下设立泾洛工程局,专门办理陕西泾惠、洛惠两水利工程,前者于1935年4月完工,可灌溉农田50万亩;后者于1937年夏完工,也可灌田50万亩以上。嗣后又相继兴办梅惠、洮惠、云亭等水利工程。农业推广方面,分别于青海、甘肃设立西北畜牧改良场及分场,并购置外国优良牲畜以推进西北畜牧事业的改进,并于陕西成立陕西农业合作事业委员会,以主持规划陕西的合作事业;鉴于新疆在国防上的重要地位,又于行政院下设立专门的新疆设计委员会,先后聘定委员80人,专负新疆的建设设计事宜^①。

虽然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最先将选择陪都、迁建首都的着眼点放到了中国的西北和中原地区,并在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开始经营西北和营建西京。但是,国民政府的此种决策,是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和政治环境决定的,是国民政府尚未实现全国真正统一的前提下作出的一种迫不得已的选择,因而具有其不可避免的局限性。而将土地虽广、资源虽丰,但地贫民困、人烟稀少、经济普遍落后、粮食尤为缺乏的中国西北地区作为中国对外战争

^① 《全国经济委员会对五届三中全会工作报告》(1937年2月),载台湾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编:《革命文献》第90辑——《抗战前国家建设史料——西北建设》(三),1981年12月版,第500、502—503页。

的根据地来建设和经营,不仅在对外战争中仍将处于一种不利地位,而且建设起来也是十分困难、收效甚微的。用作为国民党中央负主要军事与国防责任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自己的话说就是:一旦中国发生对外战争(即中日战争),即使国民政府迁都洛阳,但“政府所在地,仍不能算安全”^①。因此,要下定与日本最后作战的决心,必须重新寻找一个比洛阳、西安更为安全且地大物博、资源丰富、人力众庶的地区,来作为战时政府首脑机关及整个国家的根据地。为此,蒋介石从1934年秋开始,率其主要幕僚,用一年多的时间,马不停蹄地对中原、西北以及西南的18个省区进行巡视、考察、分析和研究。最后,蒋介石通过对各地地形、物产、交通、人文等多方面的综合考察,在逐渐控制了西南各省后,于1935年10月作出了将战时国家的最后根据地定在西南四川的重大决策^②。

与此同时,随着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及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全国各界的注意力也骤然由江西转向四川,所谓“以前关心江西匪祸猖獗的人们,现在视线都转移到四川来了”是也^③。全国性的一些著名报刊如《国闻周报》、《东方杂志》、《大公报》、《华北先驱报》等,都以极大的兴趣和篇幅关注着四川及西南的一切并对之作了大量的报道,中国科学社、中国各地新闻界、中国工程师学会以及江浙等地金融界的代表也纷纷组团,于此前后深入西南各地考察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情形。当时国内的一些有识之士,也纷纷撰文,指出四川在未来战争中所处的重要地位及其与整个国家治乱、民族复兴的关系。“四川是中国的堪察加,西南是中国的安哥拉”,就成了“九一八”后数年间国内诸多有识之士的共同认识。

鉴于四川及西南在整个国家民族复兴中的重要地位,国民党中央才迅速地乘1935年“追剿”中国工农红军之机,完成了对四川乃至整个西南的控制,并开始着手对西南地区的开发和建设,在对西南各地采取整理军队、改革政治、开发交通、统一货币、转移风气等措施的同时,也有意识地开始将东部沿海地区的一些建设转向西南。在“追剿”红军途中,蒋介石不仅在贵州倡导发

① 蒋介石:《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1937年11月19日),载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编:《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4卷,1974年版。

② 参见拙文:《试论蒋介石与四川抗日根据地的策定》,载《历史档案》1994年第4期。

③ 黄渠:《川军剿匪之经过》,载新中国建设学会编:《复兴月刊》第3卷第6、7期合刊《四川专号》,1935年3月1日版。

起了全国性的“国民经济建设运动”，而且还于1935年6月25日致电兵工署署长俞大维，指示其将东南沿海各兵工厂“尚未装成之机器应暂停止，尽量设法改运于川黔两厂，并须秘密运输，不露形迹。望速派员来川黔筹备整理”。同年8月1日，蒋介石又致电资源委员会秘书长翁文灏，要求其将“四川重工业之建设程序与其负责筹备人员从速由资源会指定派来”^①。在当时日益紧张、险恶的中日关系下，蒋介石指示将与国防密切相关的兵工企业和重工业秘密内迁西南地区之举，不仅是国民党中央政府开始积极备战的表现，而且也是建设四川抗日根据地的先声，是国民党政府有意识、有目的、有准备开发西南的起点，是国民党中央开始将其建设中国内地的注意力由西北转向西南的标志。

在国民党中央开始认识西南地区于对外战争中所处重要地位并有意识地对之进行开发的同时，当时的其他有识之士也开始认识到开发四川及西南比开发西北更为重要。他们认为：中国未来的对日战争，“势将由东北打到西南，以地理观点而言，西南一定后亡，如果这个时期大家能够努力建设，可望做到西南不亡”。并认为只有“使后亡的西南，成为不亡的西南，必须这样，中国才有前途”^②。更有论者直接著文，对比分析西南、西北之优劣及国民党中央政府将注意力由西北转向西南的原因：第一，抗战发动之后，华北各省即相继沦陷，西北以邻近战区，国人均以为不是安全区域，为策永久之计，不如先建设西南；第二，认为西北的气候与物质环境，比西南差，就建设的难易论，建设西北不如建设西南；第三，就对外交通路线论西南也比较西北便捷^③。著名学者、科学家任鸿隽所认定的“四川天府之区，应该利用来做抵御外患，复兴中国的根据地，所以整理四川，应该比开发西北尤为重要急切”的观点^④，则代表了当时相当一部分有识之士的共同想法。从此以后特别是抗战爆发，国民政府没有迁到早已确定的作为行都的洛阳和作为陪都的西安，而是远迁到长江上游、位居西南的重庆。迁到重庆之后，先前曾一度高唱入云的“开发西

①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经济发展史》第2册，（台湾）近代中国出版社，1983年12月31日版，第599页。

② 刘航琛：《戎幕半生》（18），载台湾《新闻天地》，1967年11月4日版。

③ 转引自赵宏宇：《如何巩固西北》，载《西北论衡》第9卷第6期。

④ 黄渠：《川军剿匪之经过》，载新中国建设学会编：《复兴月刊》第3卷第6、7期合刊《四川专号》，1935年3月1日版。

北”的呼声,便突然地沉寂了下来。

正是基于上述认识,所以国民党中央不仅于战前在西南的重庆设立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庆行营,以全面经营西南抗日根据地的建设,而且在抗战爆发后,迅速地宣布迁都重庆,将全国乃至全世界的注意力吸引到了中国的西南地区。

受抗战爆发及国民政府西迁重庆的影响,战前密集于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相对先进的思想、文化、科学技术、管理手段、各种人才以及众多的机关、工厂、学校、银行和文化教育机关、科学技术团体等纷纷西迁广大的西部地区。但由于此时国民党中央党、政、军及其他中枢指挥机关迁到了西南的重庆,加之人事、人力、交通、物产以及自然条件诸方面的便利和优越,所以不仅内迁到西南的工厂、学校、机关数要远远多于西北,而且在国民党政府对整个中国西部的开发中,也采取了“以西南为中心”、“先西南后西北”的方针。1938年,经济部在其拟定的《西南西北工业建设计划》中,就明确指出战时工业建设的区域“以四川、云南、贵州、湘西为主,以西康、青海、甘肃、广西、陕西为补”。在1939年5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生产会议中,行政院长孔祥熙也在开幕词中指示:“现在政府已斟酌西南各省的资源及交通,决定在四川境内,选择适当地点,为第一期要发展的工业区域,从事于煤矿、煤油及煤气的开采,并已设立酒精厂、发电厂、化学工厂等,尚正在计划中的有造纸厂及制糖厂等。”^①这样,在抗战爆发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西南地区便成了国民党政府和社会各界开发建设的重点,在1938年底至1940年间更掀起了一股建设西南、开发西南的热潮。在此期间,除了国民政府及所属有关部门制定颁发了大量的开发西南的方针政策、法规法令和计划措施,如资源委员会拟定的《西南各省三年国防建设计划大纲》(1939—1941年)、西南经济研究所草拟的《西南经济建设纲要》、国民参政会川康建设期成会拟定的《川康建设方案》外,民间各社会组织还相继成立了以集合工商农矿金融各业协助开发川、康、滇、黔、桂、湘等省资源,增进后方生产,巩固抗战力量为宗旨的中国西南实业协会,以调查研究西南各省之经济实况并拟具建设方案为宗旨的西南经济研

^① 孔祥熙:《全国生产会议开幕词》,载全国生产会议秘书处编印:《全国生产会议总报告》,1939年8月版。